

(法) 雅克·德拉儒 著
晨 光 袁 明 译

秘密军 谋杀 戴高乐

群 众 出 版 社

秘密军谋杀戴高乐

〔法〕雅克·德拉儒 著

晨光 袁明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L' O . A . S
CONTRE DE GAULLE

Jacques Delarue

本书根据法国Fayard出版社1981年版译

秘密军谋杀戴高乐

〔法〕雅克·德拉儒 著

晨光 袁明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37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01 定价：1.05元

(内部发行)

内 容 提 要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阿尔及利亚事件期间，法国的一些极端分子和军内的极右分子组织了秘密军，丧心病狂地策划了一系列暗杀戴高乐的活动，妄图推翻共和制，建立军事独裁，让阿尔及利亚永远从属于法国。本书作者亲自参加了这场反对秘密军的生死搏斗，在书中以大量翔实材料，介绍了侦破秘密军，粉碎谋杀活动的全过程。这为我们了解当时法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源泉” 别墅	(5)
第二章 从速行动	(44)
第三章 五千万法郎的人	(77)
第四章 组织“潜逃”	(106)
第五章 一意孤行	(132)
第六章 “岩羚羊” 行动	(154)
第七章 网	(184)
第八章 瑞士银行	(210)
第九章 伪造货币者	(257)
第十章 爱丽舍宫的“鼯鼠”	(293)
第十一章 遥控杀人器	(327)

序 言

整整三十余载，我不仅是一个职业警察，同时还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者。我从未对偶然选中的这个始终令我神往的职业感到过遗憾，因为它给了我非同寻常的经历，使我与人类进行最广泛的接触，不断加深对事件与人物的了解。警察的职业乃是揭露事实真相，探索奥秘和观察事物的内情。在此事业中，我满足了自己追求真理的欲望，结识了一些特殊人物，触及了“事物的本质”。

我有幸被派到司法警察的首脑机关（闻名的巴黎索赛大街十一号）工作，这是唯一具有领土管辖权的机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这种冒险的职业曾多次把我推向事件的第一线。

用历史学家批判的目光从幕后观察这一历史的形成，弄清楚它不被人所知的动力，识别台前或幕后的当事人，辨认那些不被历史所知的、或不载入史册的事件，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尝试。

这一最混乱、最动荡、几乎每日都充满着事变的时期于第四共和国衰亡时开始，到第五共和国巩固之时结束（一九五七——一九六五），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悲剧以及被人们称之为秘密军（秘密军队组织）的组织利用它制造暴力，往往是

流血的骇人听闻的行动的时期。

“杀死戴高乐，推翻共和国”，这两条相互补充的“暴力路线”是大多数谋杀行动的指导思想。

在我当时占据的得天独厚的观察岗位上，我与其他同事一样，有幸经历了大量的重大事件，理出了一直在不断策划中的大部分阴谋计划的头绪，观察到了秘密军内部的分裂状态，挫败了无数次谋杀国家总统的阴谋。在整整四年中，谋杀戴高乐将军是他那些最顽固的敌手时刻考虑的问题。多少次，他们的阴谋险些得逞。在当时，戴高乐将军之死肯定会造成无法预料的，但无疑是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为实施此计划，在四年中，最为疯狂、最为恐怖、最为危险的阴谋如喷涌而出的泉水纷纷问世。当正直的人们卷入以后，他们的创造力超过了训练有素的刺客。在某些阶段，甚至有几套谋杀计划同时付诸实施。

从一九五六年底秘密军的前身在阿尔及尔问世，到一九六五年最后的死不悔改分子被捉拿归案，我始终处于阴谋和反阴谋的要害岗位。斗争往往是严酷的。我们的对手顽固不化，不择手段，他们极力扮演“爱国主义”的角色，玩弄物质利益，特别是借助威胁手段，企图把手伸进国家的各级机构。

时间的流逝可以使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一切。当不少秘密军的老“明星”发表回忆录，把他们的暴力行动说成是值得赞扬的功绩，以企图杀害共和国总统及其总理为荣的时候，我认为从历史角度出发，很有必要把对阵的另一方，即尊重法律、忠于共和国一方的人的生活经历公布于众，作一公正的见证。

对于那些我们曾尽力将其引入遵纪守法轨道上来的迷路者，我从未表示过任何仇恨，我只是把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客观地介绍给大家，他们往往是既危险又可怜的。这几年中，人类最珍贵的品德遭受到了无情的糟蹋。

我一直对很少有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提供严肃的见证感到诧异。在动乱的年代里，警察的行动往往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般都不为人们所知。我认为这种直观的见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倘若那位至今只为五、六位老警察所知的神秘人物还健在的话，我撰写此书，就不可能不危及这位曾多次在秘密工作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的安全。

这位打入秘密军内部的我们的头号情报员（如果说我们曾被严重地渗透的话，那么我们也曾成功地有过一次重大的渗透），我一直铭记着他的代号：“伯努瓦”。他十年前已经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一个后代。只有那些曾是他的“牺牲品”的人们才能认出他来。他们会对他产生怨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怨恨过后，请他们在谴责他之前首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过失和责任。至于我们，我们得感谢他多次为我们提供情报，使我们得以挫败暗杀共和国总统的罪恶行动。提及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

在这一艰难的斗争初期，我们人数很少，深感孤立，但从未丧失过信心。我们并非“超人”，不是电影中描绘的那种警察。我们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吃过败仗，组织过错综复杂的行动，有的在最后时刻不幸流产，有的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简言之，我们是人，我们的对立面也是人。他们手中掌握着武器和炸弹，毫无顾忌地使用。而我们手中有的只是

法律的武器，我们千方百计发挥它的威力。幸运的是我们达到了目的。我由衷地认为，法国人民的前途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倘若没有乔莱特·埃尔热和克洛德·杜朗两位先生的极力鼓动，此书很可能不会问世。他们给了我宝贵的、友好的鼓励，值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叙述的所有事件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是真实可信的。如果说我删去了对第三者还有所妨碍的某些细节，没有提及对了解事件并不是非写不可的次要人物的名字，忽略了某些无损于历史的卑鄙行径的话，那么，我却始终力戒有任何编造。

现实生活是十分丰富的，有时甚至过于丰富，我们无需对它进行“美化”。

所有这些事实在当时都曾是司法诉讼，警察案卷和司法部门的对象，明日一旦归入我们民族的档案馆，它们将成为编写我们时代历史的史料。到那时，人们就会发现事实比我书中写的还要触目惊心。

第一章

“源泉”別墅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星期六，不是我值班。在一个警察的生涯中，空暇是十分难得的，二十五年前，这种机会就更加少了。当时，除了星期天，每两周才有一个星期六下午得闲。于是，我利用这天下午陪夫人上街买点东西。在我的皮包里，还有两张当晚法兰西喜剧院的戏票。

下午五时许，我回到家中。我的同事、好友让·普佐尔给我留了张便条：准备六天行装，速来。今晚启程去阿尔及尔。

一个安排好的美好的夜晚又一次向后推延了……对于一个事先无法做出计划的行当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匆忙收拾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箱子，因为旅行的诀窍就是少带行李。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做了两至三个星期的准备（在司法警察总署十二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对领导一贯的乐观主义想法必须有个正确的估价）。

当我赶到索赛大街十一号六楼的时候，已是晚上六点多钟了。有两、三个同事早已等在那里，其他同事也相继赶到。大家如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议论着这一非同小可的“周六晚餐的香肠”（“周六晚餐的香肠”通常是指周六最后时刻来临的、微不足道的、但又要占去整个周末的琐

事)。

在一九五七年初动身去阿尔及尔，肯定是执行一项意外而令人不快的使命，而且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因为当时的阿尔及尔局势危急，好几个月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不一会儿，十个人全都到齐了。我们中除了警察分局局长，就是司法警察总署的官员。大家寻思着这次突如其来的使命的目的。然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肯定是一件紧急而又严重的事。

我们每人都得到了行动指令和一笔可怜的差旅费，但是行动指令对这次行动的性质却只字未提。七时许，上司让我们安稳地去吃顿晚饭，因为飞机夜里才起飞。会合时间定在夜里十点半钟。

人们开车把我们送到库伯莱镇军用机场。子夜时分，我们登上驻阿尔及尔公使罗贝尔·拉科斯特的专机。拉科斯特是在一年前卡特鲁将军辞职后担任这个职务的。这是一架螺旋桨单发动机飞机。飞机徐徐上升，达到了正常飞行高度。我们判断着飞机的位置。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航行才能抵达阿尔及尔，这样我们有时间来互相熟悉一下。我们这十个周六晚上的牺牲品全部属司法警察总署领导。团长保罗·达菲由刑事分部派出，副团长让·贝尔明-诺埃尔、团员戈吉约、戈梅利、德尔里厄和拉福斯由镇压强盗小组派出，他们在追捕驾驶前轴驱动汽车的强盗的行动中享有盛名。普佐尔、巴雷、雷诺和我来自国家安全事务分部，近年来我们一直从事清洗占领时期的同党工作。

这次突如其来的使命带来的烦恼很快烟消云散。我们欣赏着这次幽美的夜间空中旅行，夜色深沉，冷漠的天空显得

异常明亮。然而，我们中有一人却没有分享大家的欢乐。我们可爱的“咪咪儿”是第一次乘飞机，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浑身直打冷战。我们竭力想从灯火闪烁的街道轮廓中辨认出城市。从忽隐忽现的蜘蛛网状的灯火中，我们有时认出了十分熟悉的地方：清晰可见的地中海岸和清澈的滚滚海浪，远处，巴塞罗那城的灯火隐约可见。飞机低空越过巴利阿里群岛。经过一段漫长的夜间飞行，阿尔及利亚海岸的灯光终于展现在眼前。几分钟后，飞机在白屋机场降落。这时已经快到凌晨四点钟了。

尽管夜阑人静，可是阿尔及尔保安部门的三位同事已经迎候在机场。我们分乘三辆笨拙的汽车上路了。除经梅宗卡雷和进入阿尔及尔市区时看见几支巡逻队外，沿途渺无人迹。

我们知道城市已经实行宵禁，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已经开始遗忘的那种熟悉的战争气氛。

对于这次使命的目的，阿尔及尔的同事并不比我们更清楚。由于着急去睡觉，他们把我们带到两家设备十分简陋的旅馆，并托辞说接到通知晚了，因而没有来得及找到更好的旅馆。我们在那里吃了闭门羹，敲了好半天门，才有一位惴惴不安，似醒非醒的伙计给我们打开了门。从旅馆的设备和店家的举止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一家十分低级的供妓女使用的旅馆。

凌晨四时半许，我总算躺在了一张床绷破旧的床上，心中知道早上八点半钟会来人把我们接到鲍丹大街——司法警察局巡警队的所在地。

星期天上午是在四处奔波中度过的。当我们的团长从一个办公室被打发到另一个办公室时，我们便充分利用这短暂的空暇，去寻觅一处更加舒适的住所。我们终于在离巡警队本部几十米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家干净整洁的瑞士旅馆。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集合在一起。保罗·达菲对我们说，我们将提审几天前被当地警察局逮捕的罪犯，公使怀疑他们准备策划一次反对共和制的武装暴动。他们不是穆斯林，而是侨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看来，他们跟在职的文职官员和军方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拉科斯特才要求巴黎官员出面调查。

我们很快发现，这个案件错综复杂。阿尔及尔十分特殊的气氛可以充分说明公使为什么会忧心忡忡，迫不及待地向巴黎求援。

自一九五五年以来，在确保人民安全、制止民族解放阵线恐怖主义的幌子下，许多组织建立了真正的民兵。以迫不及待伺机复仇的老维希分子为首的某些组织，频繁地向政府发起了进攻。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上台执政，组成了以居伊·摩勒为首的新政府。但是，事情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内阁总理于二月初重申了政府的两条重大原则：法国籍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穆斯林一律平等；阿尔及利亚和法兰西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可是，这也无济于事。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多数法国人认为，第一条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在整整一年中，严重事端层出不穷。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居伊·摩勒出访阿尔及尔，当时引起了一次可以称得上是骚动的事件，从此，便创了先例。接着，不久前刚接任苏斯戴尔的卡特鲁将军辞职。在阿尔及尔，人们猖狂

反对联合政策，反对在“唯一选民团”中把穆斯林的选票和“欧洲人”的选票混为一体。这些行动导致了一系列日趋激烈的游行示威，继而又出现了所谓的反恐怖主义。极端分子朝摩尔人的咖啡馆和浴室投掷手榴弹，作为对民族解放阵线炸弹的回答。三月份，议会通过特别法令，批准政府为恢复秩序所采取的势在必行的特别措施，同时，军事法庭的权限也得到加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无法抗拒的暴力行动接二连三地发生，塑性炸弹代替了双方的“对话”。八月九日到十日的夜间，法属非洲抵抗运动的一个小组引爆了安放在卡斯巴区特伯斯大街一个拱门下的烈性塑性炸弹，使上面的整座房屋倒塌，造成十五人死亡（其中有九名儿童），十四人重伤。极端分子反对跟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任何谈判，拒绝并破坏为跟穆斯林联合采取的所有措施。局势危急，必须召回预备役军人。在阿尔及利亚各大城市，散发煽动暴力行动的传单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一九五六年，在法国本土也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已经开始的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大辩论：在一月份的选举中，布热德分子^①得到了二百六十万张选票，获得五十二个席位。除去无效的席位，尽管只有三十九个席位，但是布热德分子的议员们却能够严重地扰乱议会的会场。为首的议员勒宠、德马盖和“泄密事件”^②

① 信奉布热德的人。布热德是法国法西斯组织“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的领导人。——译者注

②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执政期间，国防部最高委员会曾多次发生泄密事件，罪犯很快被查获。但是极右分子却趁机向政府发起猛烈的攻击。

身后败名裂的前特派员迪德，得到了独立派伊索尼和“新右派”的三名当选者之一蒂克西埃-维尼扬古的不断帮助。在国民议会中，暴力事端也屡次发生。布热德分子议员有计划地阻挠议事进程，有失体面的哄闹时有出现。二月份，一名旁听者公然在正在举行大会的国民议会大厅鸣枪。强大的右派势力又重新回到一九四四年被赶出的政治舞台，他们声嘶力竭、咄咄逼人，使人回想起战前的亲法西斯集团的激烈言词。

在阿尔及尔和在本土一样，政府不安地看到，这些极端分子小组与某些对共和制感情淡薄的军界人士的来往越来越肆无忌惮。政府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权威，必要时杀一儆百，把那些误入歧途者引入“正道”，反而不断暴露出被这帮“迷路者”所造成的恐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由米提贾农业工人罗贝尔·马泰尔领导的法国抵抗委员会掀起了一次新的动乱，反对“唯一选民团”，同时还散发了号召欧洲人起来暴动的传单。唯一的回击，就是解散了法国抵抗委员会和另一个由原特别局成员科瓦克博士领导的极端分子组织——法属非洲抵抗运动。

十二月二十四日，阿尔及尔军区司令兼领土守卫部队总监芒索-德米奥将军的助手雅克·富尔将军拜会了阿尔及利亚警察局秘书长保罗·泰让。众所周知，富尔将军跟巴黎和阿尔及尔的布热德分子关系密切。至于由预备役军人和军队的后备力量组成的、旨在维护治安和守卫公共设施的领土部队，则已经完全被极端分子渗透，成了“反恐怖主义”小组的基地和庇护所。

将军平静地对泰让解释说，军队将要夺取阿尔及尔的政

权。拉科斯特（他准备启程去瓦格拉休息数日）的飞机将改道飞往保罗卡泽尔，公使到达那里后将被逮捕，押往秘密地点。巴雷省长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也将缉拿归案。对这次阴谋怀有敌意的共和党将军博拉迪埃、于埃和芒索-德米奥最好的前景也是被逮捕，弄不好也许会被“中和”掉。驻扎在梅宗卡雷的领土守卫部队的机械化部队从昨天起已经进入战备状态，预定十二月二十九日采取军事行动。刚接替洛里约将军第十军区司令职务不久的萨朗将军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认为，在既成事实面前，他肯定会归顺阴谋集团。武装暴动将在巴黎引起一次阴谋分子的本土朋友早已策划好的政治行动，他们将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准备在阿尔及尔广播电台宣读的声明已经拟好，富尔将军读给泰让听。

选择泰让来听取这样的秘密一反常态，这完全是受谋求警察局的中立或争取得到它的帮助的愿望所支配。这些爆炸性的秘密吐露给一个经得起一切考验、忠于共和制的官员给阴谋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满腹狐疑的泰让事先让人在办公室里秘密安放了一台录音机。翌日，他乘飞机前往巴黎，将录音带交给了武装部队部长布尔热-莫努里，然后又去见了内阁总理居伊·摩勒。

富尔被紧急召回巴黎，受到布尔热-莫努里的接见。第二天，当他企图返回阿尔及尔的时候被逮捕。摩勒没有就此借题发挥，他相信“军队已经处于‘摇摆’之中”，悄悄地把事情平息下来，只是将多嘴多舌的阴谋家富尔将军关了三十天禁闭。其余参与阴谋活动的人没有一个被问罪。①

① 富尔准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被提升为少将。

象这样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只能怂恿他们重新犯罪。事隔不久，事情果然发生了，而且其形式愈加激烈。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晚上七点钟之前，一枚反坦克火箭弹射进了位于阿尔及尔布戈广场的第十军区司令部大楼的一扇窗户里。这枚七十七毫米的火箭弹在萨朗将军的办公室里爆炸。萨朗将军刚刚离开办公室，但是罗迪埃少校被当场炸死，巴塞上校和两名勤务兵被炸伤。

阿尔及尔保安局的调查人员很快查明，火箭弹是从第十军区大楼对面，位于布戈广场的一幢大楼的平顶晒台上射出的。火箭炮筒是用一根装有电发火装置的铸铁水管做的，固定在两块钉成X型的木板上。引爆装置的电缆由楼梯间一直通到大楼进口的长廊里。隐蔽在那里的射手可以清晰地看见二楼灯火通明的将军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的身影。射手误把罗迪埃少校的身影当成了萨朗的身影，立即启通开关，然后若无其事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调查由阿尔及尔保安局局长波德万警长领导，很快把购买电缆的钟表匠克里斯蒂昂-特隆希捉拿归案，接着，逮捕了别动队的头目科瓦克和助手菲利普·卡斯蒂耶。跟科瓦克一样，他也是原特别局成员。暗杀事件的第三个策划者米歇尔·费肖，以及加费利，广场咖啡店老板之子德拉莫尼卡，奥蒂斯和其他六名同犯也很快被捕入狱。科瓦克、卡斯蒂耶和费肖承认了他们在这次暗杀事件中的作用，并供认他们还曾参与过其他十四起“反恐怖主义”的谋杀案件。他们详尽地叙述了暗杀萨朗的准备情况，以及进行射击训练，在野外荒滩校准用来代替火箭炮的水管等细节。最后，他们坦然而明确地指出，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政